

民族地区领导干部财富观教育的路径重构

——基于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考察

李霞,刘颖

(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0)

[摘要]领导干部财富观教育是加强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环节,而民族地区因地理环境特殊、文化场域独特,其领导干部的财富观教育必然遇到更复杂的挑战。本文采用历史研究与文献分析法,考察了陕甘宁边区时期干部财富观培育的制度设计及实践样态,提炼出其“制度规约、榜样示范、群众监督”的立体化教育经验。该历史经验对解决当前民族地区部分干部功利化倾向有一定镜鉴意义。据此,文中明确提出“文化浸润、制度规约、实践体认”三位一体的财富观教育新路径,也由此为民族地区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提供可行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干部教育;财富观;陕甘宁边区;民族地区;红色文化

[作者简介]李霞(1991—),女,江西赣州人,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刘颖(2006—),女,河南南阳人,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研究”(项目编号:22CKS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304035>

[中图分类号] D633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领导干部财富观教育是新时代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财富观作为干部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影响干部从政行为及价值取向,也成为检验其是否忠诚于党、是否真正为民尽责的直接标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领导陕甘宁边区进行革命斗争,形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奉公、人民至上”的优良作风,当时用制度规约、思想教育、群众监督等多种方式塑造干部正确的财富观,由此积累了极其宝贵、可资借鉴的干部教育经验,为新时代干部价值观培育提供了极好的历史参照。民族地区目前处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领导干部的财富观教育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所涉问题更富挑战。因此,在继承延安精神红色基因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实

际,创新干部财富观培育的路径与方法,已然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及干部教育的重要课题。正因如此,本文拟系统梳理陕甘宁边区干部财富观培育的制度设计及实践经验,厘清当前民族地区领导干部财富观教育的时代境遇及现实挑战,由此提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民族地区领导干部财富观教育路径。

一、陕甘宁边区领导干部财富观教育的历史经验与实践逻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以制度设计、榜样示范、社会教化等方式培育出“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干部财富观,其背后的干部教育智慧对新时代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的价值观教育具有示范意义。

(一)制度规约:构建廉洁从政的“教育场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正确的财富观不可能自然形成,只有把刚性的制度约束与柔性的

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方能将之切实内化为干部的自觉。因此边区政府以法纪体系、供给制度为载体,创设了以“廉洁”为底色的教育场域。

1. 法纪刚性:确立“零容忍”的价值红线

边区政府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贯彻于法纪建设之中。1938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明确把贪污浪费认定为背叛人民的政治罪行,继而采用“量化定罪、从重处罚”的立法实践,既发挥了极好的震慑作用,又向全体干部传达了“公款姓公”的鲜明价值导向。统计资料显示,1939—1941年边区查处的腐败浪费案件数量从上升转为大幅下降,贪腐风气得到切实遏制。从教育的角度看,此种做法实为“反面案例警示”与“纪律规矩教育”二者结合,顺理成章地确立了干部财富观的底线思维。

2. 供给制度:营造“艰苦奋斗”的育人环境

边区将严刑峻法与精兵简政政策、低薪供给制度配套衔接。边区从1941年底开始严格执行中共中央“精兵简政”指示,有计划地进行裁撤冗员、合并机构。边区政府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物资局等6个单位原有469人,经精简之后仅剩279人,精简幅度达40%。从最高领导到普通干部,都按大致同等的标准供给伙食、发放物资,最大限度地压缩了物质攀比的空间。“限制特权”的制度安排实质上是一门“隐性课程”,让干部在日常生活中亲身感受艰苦、体会奉献,把“当官不发财”的理念从外在要求变为内在认同。这也是典型的“环境育人”模式,从根源上消解特权思想滋生的土壤。

(二) 榜样示范:领袖垂范与铁腕肃贪的“双向驱动”

价值观教育本质上要依靠“言传身教”,陕甘宁边区领袖群体以自身道德垂范、严查腐败分子的方式,建立了“正向激励”与“反向警示”结合的教育机制。

1. 领袖垂范:道德权威的“情境化教学”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过着“补丁擦补丁”的简朴生活,林伯渠主动公开制定的个人节约计划,此种做法绝不是单纯的个人作风,实质上就是一种有极强感染力的“身体化教育”。领袖的生活方式本身即是最生动、最有力的教材,向广大干部展示了

共产党人的“财富观”“幸福观”,也由此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政治生态。其“上行下效”的示范效应,让价值观教育成本大大降低,教育的可信性、实效性都得到切实提高。

2. 铁腕肃贪:维护法纪的“仪式化教学”

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刊载了社论《从肖玉璧之死说起》,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做到在‘廉洁治政’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边区政府对黄克功、肖玉璧诸案的处理绝不止是个案惩罚,实质上是一种“仪式化的公开教学”,即无论功劳多大、职位多高,凡触法违纪必予严惩,因此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场成为对全体干部“权力来自人民”的宣讲。公权绝不可作谋私之工具。铁腕肃贪的实践在干部队伍中树立起牢固的法治信仰和正确的权力观。

(三) 群众监督:激活民主参与的“外部教化”

防止权力异化、培育正确财富观既需要内部自律,又必然要依靠外部监督,故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广泛的民主监督机制,把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直接监督之下。

1. 参议会制度:权力运行的“公开化教学”

与国民党统治区仅作为咨询机构的参议会明显不同: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最高权力机关。《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对参议会的监督权作出了周密的制度设计,立法监督、人事监督、财政监督、日常监督、提案监督诸种形式构成了边区议会制度监督的基本框架。该制度设计是最为有力的“民主教育”,即随时提醒干部权力来自人民,必然要接受人民监督。因此,干部在提案审议、财政审核等环节中就会主动形成“在阳光下用权”的自觉习惯,廉洁作风也因此自然养成。

2. 群众性监督:日常行为的“社会化规训”

陕甘宁边区将民主监督延伸到基层群众。陕甘宁边区宪法性文件《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利益如受损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同时,边区在报刊开辟专栏主动鼓励群众揭发批评,更以乡选运动形式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因此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机制。干部的每一处铺张浪费、每

一次以权谋私都无所遁形于公众之中。此种监督既是对权力的制约,亦是潜移默化的社会教化,故而“克己奉公”成为干部生存其中的“文化空气”,廉洁从政遂成为自然而然的行为习惯。

二、新时代民族地区领导干部财富观教育的特殊挑战与现实语境

民族地区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场域。新时代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的财富观教育,面临着不同于一般地区的特殊语境。深入剖析这些挑战背后的教育机理,是构建有效培育路径的前提。

(一)生态与发展的张力:财富观教育的“价值两难”

民族地区大都属于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及资源丰富集区,故其“富饶的贫困”现状给干部财富观教育带来了特殊的价值两难。

干部处在生态保护、经济开发的矛盾最突出、最复杂的位置。因此,不少干部没有搞清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容易把“保护”与“发展”简单对立,滋生短视的功利主义倾向。更严峻的是,资源开发的利益空间巨大,故干部也是被“围猎”的高危群体,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形下,手中所掌的审批权极有可能异化为谋利的工具。

从教育的角度看,干部需要在复杂利益诱惑下树立“生态财富”与“经济财富”相统一的新型财富观。因此,教育绝不能满足于口号式宣传,而宜引导干部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保护生态切实内化为创造社会财富的责任担当,由此破除“靠山吃山”的传统思维定势。

(二)多元文化的交融:财富观教育的“认同博弈”

民族地区是多元文化交汇之地,故其文化多样性对干部教育有极大的帮助,但也必然带来价值认同冲突的博弈。

传统民俗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情”“面子”观念与现代化廉政要求存在张力,婚丧嫁娶等场合中正常的人情往来与异化的权钱交易界限模糊,故而易生“人情腐败”。因此,此种文化惯性实质上是对干部隐性的行为影响,也自然增加了廉洁教育的难度。

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差异从事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动摇干部的政治认同。在多元思潮冲

击下,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干部最易受到极端思想影响,也最有可能把个人、小集团利益放在国家、人民之上。

民族地区的财富观教育实质上就是一场价值观的争夺战。因此,必须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为抓手,引导干部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主动抵制腐朽文化侵蚀,切实筑牢思想政治防线。

(三)发展滞后的现实:财富观教育的“心理补偿”陷阱

由于民族地区发展基础薄弱,财政自给能力不强,其客观现实必然带来种种心理、行为陷阱,对干部财富观教育形成重大的考验。

一方面,可以从“资源稀缺”的角度分析廉政风险。因为公共资源十分有限,项目审批、资金分配等环节都是矛盾焦点,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优亲厚友”“雁过拔毛”等微腐败现象极易发生,也直接破坏干群关系。

另一方面,可以从“发展落差”的角度诱发心理失衡。东西部发展差距很容易使部分干部产生“补偿心理”和“末班车心态”,把个人仕途受阻简单归咎于客观环境,由此得出“仕途受阻,经济补偿”的扭曲逻辑,也因此更易走向权力变现、贪污腐败。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该问题可被视为物质匮乏感对精神信仰的冲击。因此,财富观教育要直面干部现实的焦虑,讲清“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再以制度保障、人文关怀消除干部心理失衡,由此潜移默化地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得失观、政绩观,从根本上抑制腐败动机。

三、新时代民族地区领导干部财富观培育的路径重构

从对陕甘宁边区历史经验(内部规约)及民族地区现实问题(外部环境)已有分析出发,本文提出适应民族地区特点的财富观教育新范式,即把红色基因转化为教育内容,把制度约束转化为教育情境,把实践锻炼转化为价值体认。

(一)内容重构:红色基因与民族文化的双向赋能

有效的价值观教育必须实现“国家叙事”与“地方知识”的有机融合,降低认知阻抗,提升教育内容的亲和力与渗透力。

1. 构建“历史—现实”贯通的案例教学体系

传统理论说教存在抽象化、空洞化的弊端,因此宜以干部学院、党校阵地为依托,有计划地开发“财富观”主题案例库。在纵向贯通方面,用“历史溯源+现实关照”的思路来设计教学。先系统挖掘陕甘宁边区时期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民族地区严守财经纪律、贯彻群众路线的史料作为“红色案例”,再引进新时代民族地区优秀干部张桂梅等把个人资产变为公共财富的“时代案例”;在教学机理方面,以案例对比法、情境再现法为手段,让干部从跨越时空的对话中体会“公私观”的一致性,由此把“艰苦奋斗”的政治要求真正内化为个人道德信仰。

2. 实施“民族文化符号”的转化与再造

以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优势为依托,把廉洁文化加以本土化表达,由此做到“以文化人”。在载体创新方面,以那达慕、民族节庆等多种文化载体为平台进行嵌入式教育,在民族艺术形式(歌舞、戏剧)中有机融入“清廉”“公正”等价值观念,把抽象的廉政术语变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审美符号;在话语转换方面,有系统地组织双语教育素材,以民族语言讲解“廉洁”“诚信”的现代治理内涵,再从民族谚语、格言中挖掘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之处,由此让正确财富观生根发芽。

(二) 制度情境:构建生态优先的导向机制

教育不仅限于课堂,更在于制度设计所营造的“隐性课程”。通过优化考核与评价机制,使制度成为引导干部树立正确财富观的指挥棒。

1. 优化以“生态财富”为核心的政绩评价体系

针对民族地区“富饶的贫困”及生态脆弱的特殊区情,必须改革单一的GDP导向。在指标重置方面,大幅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福祉改善、民族团结进步等指标的权重,建立差异化政绩考核标准;在价值引导方面,确立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并重的评价导向,设立生态保护“一票否决”制。通过制度设计,向干部传递“绿水青山就是最大财富”的明确信号,扭转“靠山吃山”的传统资源观,引导干部追求可持续的“绿色财富”。

2. 强化数字赋能的透明化监督体验

用数字技术来营造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环境。浙江省对此有过示范:其公权力大数据监管平台实时预警行权异常,用“技术理性”强化“制度刚性”,

将制度成果予以固化,进而优化权力配置机制。在技术嵌入方面,对惠民资金、项目资源管理等风险点实行“互联网+监督”,以区块链、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建设自上而下、从中央直达基层、从预算到终端都可全程追溯的数字化监管平台;在教育实效方面,以数字化平台压缩权力寻租空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因此所采用的“技术刚性”既是对行为的约束,也实质上是在培养干部在监督之下行使权力的习惯,自然宜于形成“权力不可私用”的法治思维。

(三) 实践体认:深化一线锻炼与容错纠错机制

财富观的培育最终要在社会实践中完成确证。通过组织化的实践锻炼,促进干部在“知”与“行”的统一中砥砺前行。

1. 强化基层一线的“沉浸式”实践育人

由于部分干部缺少基层锻炼的经历,因此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推行一线墩苗工程。在场域选择方面,有计划地选派干部到乡村振兴一线、边境地区、重大项目前沿等“吃劲”岗位;在体认机制方面,让干部直接从事集体资产管理、生态补偿落实诸种具体工作,由此亲身感受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及分配的公正性要求,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过程中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也因而领悟“权力来自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真谛。

2. 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激励性教育

民族地区改革探索中必然存在种种不确定性,因此要建立宽容失误的保障机制,自然就可消除干部的“避责”心态。在机制创新方面,就容错纠错清单加以精心设计,把“为公失误”和“为私贪腐”予以区分;在心理重塑方面,以制度形式保护干部在推进绿色发展、文化保护中进行首创性探索。教育干部不要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宜着眼于造福一方的长远价值,培育起“功成不必在我”的财富观和政绩观。

四、结论

陕甘宁边区以制度规约、榜样示范、群众监督等方式构建起革命时期干部财富观的教育范式,新时代民族地区领导干部财富观的培育又面临着生态与发展的张力、多元文化博弈、发展滞后的心理陷阱等新挑战。因此,本文明确提出民族地区宜构建“文化浸润、制度规约、实践体认”三位一体的财

富观教育新路径。在内容上让红色基因与民族文化双向赋能,在情境上创设生态优先的制度导向,在实践上以一线锻炼及容错机制重塑干部的价值追求。此路径既是对延安精神的直接而有力的当代传承,也是党的自我革命、夯实执政基础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落实,利于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民族地区干部队伍。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纪念乔石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6.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11:538.

[3] 赖熹姬.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节约运动[N]. 团结报,2025-9-11(5).

[4]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48.

[5] 王纪刚. 从延安走来——中国共产党如何从危难中奋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26.

[6] 王雪. 探索大数据监督融入治理新路径[J]. 中国纪检监察,2025(17).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九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

[8] 韩大梅. 新民主主义宪政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64.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th for Wealth View Education of Leading Cadres in Ethnic Areas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LI Xia, LIU Yi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2200, China)

Abstract: Wealth view education for leading cadr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cadre contingent. Due to their speci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unique cultural field, ethnic areas are bound to face more complex challenges in the wealth view education of their leading cadres. Using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practical patterns of cultivating cadres' views on wealth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and summarizes its three-dimensional education experience of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role modeling, and mass supervision". Th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ovides certain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utilitarian tendency of some cadres in ethnic areas at present. Accordingly, this paper clearly puts forward a new trinity path of wealth view education featuring "cultural infiltration,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and practical realization", thus providing a feasibl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in ethnic areas.

Key words: cadre education; wealth view;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ethnic areas; red culture